

中国视野、历史机遇： “万里茶道”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申遗与 张家口话语权构建

常忠义 刘秋根

2013年习近平主席向世界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在俄罗斯、2014年在蒙古国，习近平主席相继肯定了17世纪之后“万里茶道”对于当代中俄蒙三国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近年来，“万里茶道”作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申遗项目逐渐展开，张家口以茶道行将走出长城、走入草原戈壁的最后节点，以及主导了整个清代及民国前期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的历史，成为申遗项目的重要节点城市。张家口又为察哈尔历史文化渊源重地，如何准确地以当代中国视野把握历史机遇，把握中蒙俄国际合作关系与民众公共外交产生共鸣之视点，以学术研究为基础构建确切的张家口话语权与相关释读，对于“万里茶道”申遗项目犹有意义。

申遗工程与张家口历史地位

2019年3月中国国家文物局正式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21年11月国务院将其列入“十四五”文物保护规划，为中

蒙俄三国的国际合作奠定了基础，“万里茶道”成为一项中国境内相关九省（区）共同参与的宏大文化工程。

“万里茶路”申遗主体和主题

中国的茶叶史非常久远，研究著述颇丰。“万里茶道”以茶叶史为主体和主题，具有特定的界限与内涵。首先，有着特定的地域与时限，即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以茶叶为大宗商品的生产加工、长途贩运、草原贸易与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为载体，且以当代国际视域下中蒙俄三国间形成的万里茶叶贸易路线为主线。其二，万里茶路上巨量的茶叶贸易是由市场供需关系所决定，贯通了从产地到消费市场的庞大产业链，成为17世纪后期经济全球化走向的侧面映照。其三，“万里茶路”并非由国家主导，而是纵跨三个世纪、以商民商家为主体的民间商贸。商贸除带来广大地域内民众所需生活物资的互通有无之外，其相随的人文交流、民生的改善、国家税收的增减等，实际上也涉及到了相邻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外交、民族等方面。

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中的张家口主导地位

清康熙朝二十八年（1689）中俄双方应时政府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成为途径漠北漠南蒙古草原的两国间陆路往来之依据。二十年后确立了以色楞格至库伦至张家口的俄国官方北京商队途径，张家口成为长城边口唯一通行要地。从清雍正五年（1727）《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直至1929年苏中断交，历史延脉的惯性与地理方位的优势，张家口始终主导着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成为茶叶南来北往的集散重地。中国清史档案与蒙古国档案，以及近些年面市的民间文书，均有充实的史料依据。

“北商、西商”与“东口、西口”。中国当代历史学界从1980年代的“商队茶考释”研究文章与《中俄茶叶贸易史》专论起始，其后近四十年

中，相继以大量档案史料为据进行研究，确认久居张家口城区内的山西茶商经库伦（现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继续北上经营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被称之为“北商”。而位于漠南草原之上的归化城茶商，经库伦西行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直至新疆方向，史称“西商”。

东、西两口（东口为张家口，西口为归化城，归化城现为内蒙古呼和浩特）始为民间商家所用称谓，起自清嘉道时期，成为清代民初中国北方贸易集散的二个重要市口。由于山西茶商们长时期垄断了蒙古草原与中俄恰克图的茶叶贸易，两口茶商长途贩运进入漠北草原后各自有着传统的销售地域，以致在砖茶市场上形成了各自的砖茶规格系列，不存在无序的竞争。两口茶商在恰克图茶叶贸易上的交叉，仅在清同治六年（1867）其它缘由而呈奏朝廷同意，“西商”曾短时期“假道（借道）恰克图”，并非意在与张家口茶商争夺恰克图茶叶贸易之利。

张家口历史遗迹辨析与历史档案挖掘

张家口位于“万里茶道”中国境内路段，行将走出长城，进入蒙古草原戈壁之前的最后节点。将近300年的茶叶贸易史给这座城市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历史遗址遗迹。曾经的茶商、驼队运输等各路商家也为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账册文书等纸质文献。

张家口草厂巷街区历史遗迹，位于张家口堡外北侧的草场巷街区，东西走向（长600米、宽4米），地势高低及走向与堡内一侧相同，且以明代筑张家口堡墙挖土造成的北关沟壕为界。清代以来逐步以茶栈、驼运等相关行当聚集后而形成街区，街区完整印证着产地茶叶南来停顿、修整、分销转运、北出长城再做出发的集散功能。这条主街以“草厂”起始，街内两侧小街巷之冠名，呈现着历史上驼号、茶店（栈）、缸房（酒坊）、面铺、口袋、井棚（水井）等旅蒙商家相互配套的行当，也有以清乾隆后期商家字号命名的

“万升（盛）玉”历史遗存街巷。主街西端外还曾经有过山西祁县人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二月初二开设的“晋昌源”茶栈历史记录等等。

文献挖掘与清代“茶市”研究。清代南方茶叶运至张家口、归化城后，聚集在地的大小茶商参与交易形成了繁荣的“茶市”。民间历史契约文书——咸丰、同治《兴隆魁信稿册》、光绪《玉記西口书信稿账（大玉川）》、同治《义記东口来书稿账（德长义）》等多件相关史料，记载了东西两口砖茶“茶市”中的多种交易方式、随期交易量、大小茶商相互间的业务关联，以及张家口至库伦的确凿驼运时限、运费，承运责任与赔付等等重要讯息。

草场巷街区作为“万里茶路”历史遗迹完整留存于张家口老城区内，是载有重要历史信息的代表性街区、活化石街区。目前在“万里茶道”相关中国九省（区）的城镇中还未曾发现类似遗迹。河北大学等院校历史研究学者曾经多次予以实地考察记录，而对于张家口在“万里茶道”历史进程中所遗留下来的民间文书档案，也在有效地整理中。

近代中俄恰克图贸易与张家口的历史地位

近代二次鸦片战争后的系列中外不平等条约中，中俄条约中有多件涉及到张家口，由此凸显了近代中俄关系史、中俄恰克图外贸史上张家口的重要历史地位。如清同光朝时期，俄国政府反复向清政府施压，致使俄商争得在张家口长城边墙之外（大境门外、口外）设置茶栈的重要商贸利益。有学者统计在1868—1870年的三年间，经张家口、恰克图输往俄国的中国货为全部输俄商品的99%；光绪朝后期京张铁路的筑建路权谈判，沙俄曾视为其利益范围，不得他国染指；清末民初，张家口城区的自开商埠受到沙俄方面的严重关切与反对等等。

万里茶道回流物资催生的张家口皮毛业

17世纪中叶之后的“万里茶道”，贸易体量巨大，商民们换回来的皮毛为回流大宗物品，其中有来自俄罗斯的珍贵野生动物毛皮与粗细呢绒织品，以及蒙古草原蓄养动物毛皮与羴毛等。作为茶叶贸易集散重地的张家口，贸易回流同时催生了本地的皮毛支柱产业。如：乾隆四十九年《（张家口）永丰堡水母宫碑文》有“如上下堡皮行亦重有赖焉，羔羊之皮濯以清泉”之记；咸丰年间皮毛业兴盛，坊间有着“一品玄狐二品貂、三品狐狼五品羔”之闻言；清末民初有三四十家外国洋行在本地采购大量毛皮、羴毛等；民国后期，张家口形成了分工有序的七大皮毛类行当，如生皮销售又分为皮毛代理与皮毛贩卖，皮裘行分为泡制与缝制等等。

准确构建“万里茶道”张家口节点的话语权

张家口作为中国北方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深入融合之地，地势地貌上为华北平原与蒙古高原接壤处。明朝迁都北京之后，宣德四年（1429）筑建张家口堡，成为都城西北方向的拱卫要地。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朝廷设张家口都统（察哈尔都统），直至1952年中央政府裁撤察哈尔省建制，先后一百九十多年贯穿着察哈尔历史文化的脉络，张家口成为华北地域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张家口现以“万里茶道”申遗的河北省唯一参与城市，其话语权的构建需要以中国视野、世界视野去做定位；以学术研究辨析相关历史进程，建立准确通俗的公共史学，摆脱狭隘的地方文旅宣传；以民间公共外交为视点与蒙俄两国学界与民众产生共鸣；从三个层面切实融入、深入参与到中蒙俄三国“万里茶道”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申遗合作中。

明代张家口“马市”与清代“茶市”

“茶马互市”是明代中后期从长城边墙展开的与草原民族的商贸方式，以茶叶、绸缎等多种生活用品换得草原马匹。相关研究文章指出，明代长城九边沿线的互市呈“西茶、东马”分布，张家口与草原民族的互市为“马市”，输出品亦非茶叶。清以降，张家口以集散功能为漠南漠北草原所需物资流通服务，并为中俄恰克图边贸服务，其中茶叶为大宗商品，形成的“茶市”极为显要。张家口有着传统的“市圈”与商人群体，且以距离京城最近、北出长城连接漠南草原之地理优势，故此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设张家口都统（察哈尔都统），也承担起清廷为草原贸易“票照”的签发职责。

由此，笼统的张家口“茶马互市”之议，是将两个朝代的概念混为一谈，并不确切。

“皇商”与“官商”之辨

清代以来，张家口不断有山西商家商人聚集此地，逐渐形成了“晋商”这一重要群体，或可称谓“东口晋商”。清代在张家口的山西商人，可分为两个阶段。其一记载于乾隆版《万全县志》中，是被清廷召入、服务于内务府的“八家商人皆山右（注：山西）人，明末贸易来张家口……自本朝定鼎后承召入都，设宴殿蒙赐上方服饌，自是每年办进皮张，交内务府储司”。实际上所谓“八家商人”的经商资本是官家本钱，以其之首的范家为例，清档案《奏为范清济呈借帑银事（乾隆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中确切称其为“官商”。而另外一个阶段的群体，方是清代中期之后聚集在张家口的大量山西商人，其经营资本皆为自有本金，特别是垄断性的经营茶叶贸易而成为了清代富甲一方的著名商帮。

多年来，一些文旅史话将“八家商人”演绎“八大皇商”，有违史实。

张家口至库伦商路“大道说”之误

“万里茶道”作为世界商业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须以中国视野、世界视野提升认知高点，方可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蒙俄经济走廊愿景做好历史衔接。而历史衔接则需以各类文献史料与历史遗迹为基础，经过严谨的学术研究，去还原宏大的历史叙事。

清代至民国早期，张家口至库伦（现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旧称）为“万里茶道”上非常重要的一段，且在20世纪初始各类文献逐步有“张库商路”与“张库汽车路（张库汽车运输线路）”之说，实为百年前的历史原貌、原始表述。近二十年来，旧时代商民们以驼运牛车艰难行走在没有标识的茫茫草原戈壁，这种历史商路（注：非有形构建道路）言其为“大道”，这种以语言学上的“夸张比喻”，作为地方旅游文化口号看似无可厚非，但这种表述一则脱离了历史原貌而易生误导；其二“大道说”之渲染造势不利于“万里茶道”申遗工作的三国间合作；其三不利于申遗中张家口节点话语权的构建，易生歧义而被边缘化、弱化。

库伦现为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时下将邻国首都旧称与中国地市级城市张家口用“大道”直连起来并不匹配，难以得到蒙俄两国学界与民间公众的认可。事实证明，近些年来这种“大道说”，无论是影视等类文化产品，或是在“万里茶道”整体申遗的项目进程中，均没有走到相应的大平台、大舞台上而被接受。作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申遗项目，事关中蒙俄三国间的合作，地方性的文化旅游宣传要在尊重历史原貌之下，以广阔的中国视野与胸怀去尊重邻国民众间的公共外交往来，避免产生负面影响。

严谨的史学研究 with 公共史学的建立

中国史学界相关张家口历史的学术性研究已历经四十年，涉及商业史、金融史、城市史、民族关系史、中俄贸易史等诸多领域，各类高校及其他

学术单位以张家口历史为研究题目（或相关题目）的硕博论文十余篇，仅在2020年便有两篇博士毕业论文。2016年8月，张家口以北京冬奥会协办城市召开了“张家口·冬奥会与一带一路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蒙古、美国等八个国家的专家、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近300人参加；2020年12月，公共外交智库察哈尔学会在北京主办了“察哈尔口岸贸易文化座谈会”等等。

近年来，有著名学者对社会大众关注历史的热情予以肯定，同时就当今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指出管理者与社会大众迫切需要通过提高历史认知、鉴别与欣赏能力。在历史研究上，专业学者当责无旁贷去服务社会、增强应用性。专业史学向公众史学的提炼转化，以及向大众的普及，需由专业史学工作者做好引领。在对历史的解释应用、媒体宣传、文化产品等方面，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与严肃的文化导向，避免庸俗化、浅薄化、演绎化的倾向。

结 语

“万里茶道”作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申遗项目，建立在考古学、历史学、文物学、文献学各学科严谨的学术调研与研究基础之上，同样需要社会各界参与其中。中国境内的申遗工作已经做出了大量颇有成效的基础性工作，但也存在着各地各界自话自说、遗址挖掘欠缺、文旅宣讲与史学研究不相吻合以致产生偏向或误导等问题。如何将“万里茶道”整体宏大史实的叙事与各个节点的微观研究紧密联系，张家口作为申遗项目关联中蒙俄三国合作的重要节点城市，若能构建中国视野下“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的公共外交融洽关系，以完整史料为佐证的话语权，将会为申遗项目做出应有的贡献。

进入21世纪后，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尽管风雨重重，但中国领导人仍登高望远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无论是“一带一路”

倡议，还是“万里茶道”世界文化遗产申遗的三国合作，当是机遇与挑战共存下的中国宏大视野的体现。

马克思曾经对于19世纪的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路线与张家口之关系做过阐述，但历史商路已经远去。2022年张家口以协办北京冬奥之城再次引起世界瞩目，茶道与雪道相间，期待“万里茶道”世界文化遗产申遗中国境内工作在国家文物局与九省（区）通力合作下圆满完成。

常忠义：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会理事，河北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刘秋根：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社会经济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

the public. The Willow Art Troupe of Yangzhou Public Diplomacy Association is such an NGO that has been long engaged in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with art as the vehicle for implementing the idea and mission of public diplomacy.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how to effectively allow NGOs to play their roles in better promoting understanding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aking the Willow Art Troupe of Yangzhou Public Diplomacy Association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gains and losses in the troupe's development process, illu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many issues in China-Japan cultural exchanges from a new public diplomacy perspective, including interaction, academic support, coordin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balance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interests, as well as multiple activity modes with an online and offline combination, and then further considers how to innovate with a broad perspective and a wide vision.

A Chinese Vision and Historical Opportunity: “The Eurasia Tea Route” Worl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Application Project and the Power of Zhangjiakou’s Discourse

Chang Zhongyi & Liu Qiugen · 105 ·

President Xi Jinping propose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to the world in 2013, and spoke, first in Russia in 2013 and Mongolia in 2014, about the histor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tea route that linked the three countries of China, Russia and Mongolia in post-17th century. The application for entering the “Eurasia Tea Route” into Worl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list has seen, in recent years, Zhangjiakou being an active and important city. It was where the route went north beyond the Great Wall, into the Gobi Desert and grasslands, serving as the main actor of tea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Kiakhta in Russia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Zhangjiakou was also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origin of the culture of Charhar

reg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Zhangjiakou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historic opportunity presented by the application, with a contemporary view, clearly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a, Russia and Mongolia from an angle of public diplomacy, and build its discourse based on academic research.

A Portrayal of the China-Brazil Friendly Exchanges—Book Review of *The Story of China and Brazil*

Bao Yu · 114 ·

The book *The Story of China and Brazil* (edited by Zhou Zhiwei and Wu Changsheng and published by the Continental Communications Press in March 2020) was published on the occasion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45th anniversary of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Brazil and China. It was jointly recommended by Aldo Rebello,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Brazil, and Yang Wanming, former Chinese ambassador to Brazil with their respective prefaces. The book consists of four parts: Memory, People,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mall stories but reflecting a great history”, the book offers a comprehensive and enthusiastic presentation of various aspects of China-Brazil friendly exchanges, including the long history, prominent people, cooperative projects and cultural exchanges. It is of high reference value for understanding the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 of China-Brazil public diplomacy.